

由报告文学创作看延安文艺转型

商昌宝,邱晟楠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摘要:延安整风运动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作为延安文艺的分水岭,使得延安作家的文学创作、理论话语阐释发生巨大转折。从整风前后延安文艺状况的比较着手,以报告文学为视角进行研究,认为报告文学在《讲话》发表后异军突起,不但成为实践《讲话》“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精神的重要文学样式,而且成为延安文艺由多元向一体化转型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讲话》;延安文艺;报告文学;整风运动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1-0126-05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文艺是中国文艺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以延安整风运动和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界,延安文艺整体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给延安文艺带来了话语表达与文学形式上的转变。在这思想的指引下,报告文学这一文学体裁作为实践《讲话》的载体大量涌现,并成为表现工农兵的重要阵地和文艺样式。

一、整风前的延安文艺状况

(一)多元的延安文艺

延安在抗战大局中获得合法政权身份后,在初期政治和文化的相对宽松政策下,大量文化人开始涌入延安,也一度使得延安文艺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体现为许多文学刊物和文学社团大量涌现,如《文艺战线》《大众文艺》《文艺月报》《谷雨》《诗刊》等,中国文艺协会、边区文协、边区诗歌总会等,还有鲁

迅艺术学院、部队艺术学校等多个研究机构。对此,何其芳就曾自豪地宣称:“大后方的都市可以用洋楼、汽车、百货商店、电影院向延安骄傲,但说到铅印刊物,延安却可以说:‘咱们来比比吧!’”延安文艺界思想活跃,文人创作相对自由,文艺现象丰富多彩。如“文抗”的文艺小组和“星期文艺学园”并存,陈企霞与何其芳、萧军与周扬和刘雪苇等都曾展开过文艺争鸣,而且还出现了以萧军、塞克、王实味、冼星海为代表的“延安四怪”,他们或倨傲不羁,或沉郁内敛,都通过作品和行为抒发真挚情感。特别是一些带有强烈启蒙意识和使命感的“暴露派”知识分子,对延安生活现实中的不足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解剖与抨击。在1942年春天,这种批判话语达到高潮,先是有蔡若虹、张谔、华君武在延安军人俱乐部和“文抗”作家俱乐部举办的“讽刺画展”引起轰动。之后有大量针砭时弊的杂文出现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形成了“杂文运动”。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我们需要杂文》,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王实味的《野百合

收稿日期:2015-05-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CEW076)

作者简介:商昌宝(1973-),男,吉林延边人,副教授,文学博士。

花》,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等不但名噪一时,而且源远流长。其它如延安文协的《谷雨》、青委的墙报《轻骑队》、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也都以各种文艺样式来揭示延安的不正常现象。可以说,无论是“歌颂光明”还是“暴露黑暗”,前期的延安文艺呈现出自由、开放、宽容的姿态。

(二) 报告文学的初步发展

一般来说,报告文学这种文学体裁讲究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之上塑造艺术形象,用文学的方式来反映现实生活。茅盾将其界定为:介乎于新闻报导和小说之间,兼有新闻和文学特点的散文,要求真实,运用文学语言和多种艺术手法,通过生动的情节和典型的细节,迅速及时地“报告”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简言之,作为非虚构性的文学体裁,与其它文学样式相比,报告文学的特点就是更强调真实性。

在整风运动和《讲话》出台前的延安,报告文学数量不多,表现领域也较为松散,大体统计有:反映抗战时期军民对敌斗争的,如刘白羽的《为祖国而战》、雷加的《前线故事》;表现延安边区生产生活的,如吴伯萧的《丰饶的战斗的南泥湾》、茅盾的《记“鲁迅艺术文学院”》;描写高级将领的,如丁玲的《彭德怀速写》、荒煤的《刘伯承将军会见记》、沙汀的《随军散记》等。此外,还有萧三的《续范亭先生》、田野的《八路军医院》、柳青的《空袭延安的二日》等。在这一时期,报告文学这一体裁并没有得到重视,大部分作家还是以创作小说、诗歌、杂文等文学审美性较强的作品为主。曾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的丁玲回忆说:“文艺栏在开始一段就只登小说、诗、翻译作品,报告文学都登得很少。”^[1]

二、整风后的文艺状况

(一) 整风与《讲话》后的延安文艺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在《讲话》中确立了“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意识形态规范。座谈会后的1943年3月10日,中组部、中央文委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就落实《讲话》精神、文艺工作者下乡问题进行思想动员和工作布置。在这样的精神指引和强力推动下,延安作家经受了严峻的思想洗礼和现实考验。

第一,思想方面。座谈会后,整风运动进入高压阶段,无论“暴露派”还是“颂歌派”,都要深刻

检讨自己,努力改造思想。《讲话》的“指挥棒”令延安文人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过往文艺思想,同时贬抑和否定既往的创作。如周立波在《思想、生活和形式》《后悔与前瞻》中,对自己“小资产阶级王国”进行反省。何其芳在《改造自己改造艺术》中对个人历史做出全面否定,他表示“旧我未死,心无杂念,不但今天在革命队伍中步调不一致,甚至将来能否不掉队都很担心”。此外,还有艾青的《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萧三的《可喜的转变》、舒群的《必须改造自己》等都刊发在《解放日报》上。

第二,创作方面。经历整风运动和《讲话》洗礼的作家们,经过一段创作的“沉寂期”后开始转变原有的写作风格和表达方式。其标志就是:几乎完全放弃杂文、小说、散文的创作;变欧化的语言为最简单的口语、俚语以贴近大众;作品内容由起初的“暴露黑暗”,转向赞美边区的生活面貌、新人新事和劳动模范;先前以批判、暴露、讽刺为基调的杂文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秧歌剧、街头诗歌、通讯、报告文学等更加“通俗化,大众化”的民间艺术样式。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和秧歌剧《兄妹开荒》、歌剧《白毛女》等应运而生。

第三,文艺刊物与社团方面。不少刊物陆续停办,尤其在延安文艺整风进入高潮阶段中,仅存的《诗刊》《谷雨》《文艺月报》等8种文艺刊物在1942年全部停刊。《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全面改版,“文艺栏”取消,改为综合副刊,此后的所有文艺作品除了单本发行外,全部都登在《解放日报》这一报刊上。

大量作家或被派入中央党校学习,重点学习整风文件,或是响应号召“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2],走进农村,深入群众。作家们此时不是无暇写作,就是不再进行创作,以至于《解放日报》第四版竟发生“稿荒”,需要毛泽东亲自开列名单征稿。如陈荒煤以文学为主,每月12 000字;柯仲平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每月12 000字;艾思奇以文化及哲学为主,每月10 000字;周扬以文艺批评为主,每月10 000字等,共计62 000字^[3]。有研究者统计,整风后《解放日报》综合副刊每月的六七万字,与整风和《讲话》前的几十万字不可同日而语^[4]。

(二) 报告文学的异常繁荣

翻阅整风运动后的《解放日报》,随着杂文、诗歌、小说等文学题材的淡出,以描写劳动模范为主题的报告文学大量占据报纸版面。

三、延安文艺——“党的文艺”

(一)“新的主题”

延安文艺整风和文艺座谈会后,文人们不再沉溺于自我抒情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只写符合政治需要的作品,这也意味着从整风运动和《讲话》发表后开始,绝大多数作家们投入到了“新的主题”下体制话语的生存创作,占据延安文坛的不仅是政治化色彩浓重的报告文学,还有通讯、秧歌剧、街头诗等其他艺术形式。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主题在报告文学得到鲜明体现。从描写劳模英雄、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报告文学作品中可见这一阶段文学创作的特点,即作家们总是想努力赶上文艺政策的步伐。艾青就曾说过:“我们跟在政策的屁股后面追,人家进行土改时,我们写减租减息,人家进行复查了,我们写清算,人家进行生产建设了,我们写土改……”^[5]此时的作家们开始明确自己“为党为政治服务”的文艺工作者身份,也认识到文学作品服务于政治的功能,抛弃原来充满独创性的文学创作体式,写作大量以“真人真事”为描写对象的通讯、速写和报告文学作品。当作家在对党“一次塑造”的工农兵进行“二次塑造”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讲话》精神的践行。作品中的典型人物、英雄劳模也无不在体现着新的寓意。这种“新的主题”意识在1949年后被发扬光大,并曾对战争题材产生巨大影响。在“新的主题”确立过程中,知识分子作家在无阶级立场的衡量准则之下,以一切为党、一切为革命的目标来进行创作,向“工农兵文学”努力靠拢的趋势,最终由自由撰稿人成为延安整风后合格的文艺工作者。

在1949年7月5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扬在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中说:“文艺座谈会以后,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6]周扬所说的新的文艺中,以“真人真事”为主的报告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占了很大比重,这一方面表明报告文学是文艺工作者走向工农兵的代表和示范,得到文艺界领导的认可和表扬;另一方面也表明“文学组织化”在《讲话》前后成为一种新的文学表达方式。

(二)“新的人物”

整风运动和文艺座谈会后,大量面向工农兵的

1942年5月5日开始,《解放日报》上出现了以《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为题的报告文学,自此不断有大量表现工农兵模范的作品被刊登。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工农兵模范成为报告文学的主人公,并集束性地占据了综合副刊的版面:模范党员申长林、模范青年战士兰俊杰、模范工人范耀武、模范合作社主任呼天佑、养猪英雄杨老婆、养羊模范刘占海、拥军模范张振隆、开荒英雄霍殿林、纺织英雄李兰英、劳动英雄李学义、炭工英雄蔡自举、模范班长张秉权、难民劳动英雄陈长安、劳动诗人孙万福……

再以作家的创作情况来看,丁玲写作了《田保霖》《民间艺人李卜》《袁广发》和《十八个》等,欧阳山写作了《活在新社会里》《人山人海》等,魏巍写作了《晋察冀英雄多》,陈荒煤写作了《模范党员申长林同志》,刘白羽写作了《海上的遭遇》《人们在战斗着》《爆炸的土地》等。其他还有周立波的《王震将军记》、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贺敬之的《选举》、师田手的《快乐的秋天》、马加的《减租》、萧三的《我又来到了南泥湾》等诸多报告文学作品。孔厥、西戎等之前名不见经传的作家也因为报告文学的创作而活跃在文坛上。

在这股报告文学热的初期,作品主要刊登在综合副刊,后来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和《讲话》精神的强化传达,有一段时期,关于“怎样养羊、怎样养猪、怎样提高棉花产量”等宣传文字甚至取代了对抗战进程的报道,大量的生产消息充斥报端,其中包括哪个村开荒多少,哪一家的婆姨纺纱多少,劳动英雄的生产工作进展如何,谁又打破了生产记录……最高潮时,整个《解放日报》副刊的版面几乎全部被歌颂、奖励工农兵劳动模范或是表现农业生产竞赛、合作社的报告文学所占据。这其中呈现出这样几个写作特点:劳动模范在作品中基本是以“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被书写,报纸成为不断向劳动英雄喝彩的宣传册,新老作家一起高唱颂歌。

报告文学得到从未有过的迅速发展。歌颂农民、劳动英雄等文字几乎占领了当时所有的文艺领地,报告文学的兴起所体现出的形式和语言的单调也成为了整风后延安文学的特征。秧歌剧、街头诗、信天游体小说等大众化文学形式更是代替杂文、文艺争鸣、散文、翻译作品,变为延安文艺的中流砥柱。在“文艺面向工农兵”的指导思想下,与表现工农兵最为贴近的报告文学实现了跨越式的大繁荣、大发展,延安文艺的整体形式发生了转折。

报告文学得到快速发展,随着以工农兵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大举进入表现领域,无论是知识分子身份的作家还是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都在此过程中完成了集体退席。

第一,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身份开始隐退。文艺座谈会后,知识分子与工农兵大众之间的关系发生置换,知识分子成为大众改造的对象,所谓的启蒙者成为被启蒙者,而工农群众成为教育知识分子的主体。在这样的转换过程中,延安边区的知识分子紧跟形势,及时表示要改造思想,跟上组织。如曾是“暴露派”的丁玲在《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中深刻检讨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出身,提出了:“即使是感人的东西,只要有不合与当时无产阶级政治的任务之处,就应该受到批评,就不是好作品。”曾是“颂歌派”的周立波也以真诚的自我解剖和下乡行动落实毛泽东所提出的知识分子要进行思想改造的要求。他说:“在不远的将来,革命历史上和现实生活里的真正英雄,刘志丹、赵占魁、吴满有和申长林,会光彩夺目的走进我们的书里,鼓舞我们,并且教育我们年青的一代。”这些作家、艺术家们在整风运动中不断进行着自我改造与精神忏悔,大部分新成长的延安作家也欣然走上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为工农兵而创作”的文学道路。

第二,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同样完成退席。在整风运动前的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曾占据着“启蒙者”的地位,他们常常是带着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相对闭塞、落后环境下的“小生产者”。如从丁玲受批判的短篇小说《在医院中》中,可以读出作为知识分子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和对于无知、自私、保守的农村小生产者的批判。但是这种居高临下的“改造者”姿态在延安整风运动后迅速发生了转变,并且这种转变经历了“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众相结合”和“知识分子成为了被改造的对象”两个阶段,于是大量描写工农兵劳模英雄的报告文学让知识分子的艺术形象退出了文学艺术的舞台,即使偶尔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也是轻视劳动、怕脏、夸夸奇谈的反面形象,在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劳动群众衬托之下显得异常渺小、可笑,成为不断被取笑、批判、改造的对象。而这些被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因为思想立场的不纯洁,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信仰,在改造的过程中用所有可能的方式抛弃“旧我”。在《讲话》后的报告文学创作中,丁玲的《田保霖——靖边县新城区五乡民办合作社主任》、艾青的《养羊英雄刘占海》等作品在当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使延安边区英

雄高大的形象深入人心。

总之,无论是作家本身还是作品中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集体退席成为时代的需要。尤其是1949年后,代之的是各种“新的人物”,包括经历过延安思想改造的出身于工农兵的作家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新的工农兵形象。

(三)“新的语言、形式”

报告文学在延安时期的繁荣发展也引发了写作语言的转变。整风运动与《讲话》发表前的时期,延安文坛主要由左翼作家组成,这些经历过“五四运动”的作家都曾受过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在写作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带有“欧化”倾向,也就是翻译化的语言风格。毛泽东在《讲话》中论及文艺脱离工农兵的问题时曾批评道,“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

在这样的要求之下,作家们意识到必须要调整创作语言,修正曾经习惯的表达方式,要抛弃那些学生腔、八股调和欧化语言,让自己尽快融入到劳动群众中。于是,作家们纷纷下乡搜集材料和方言俚语,努力使语言“朴实”“丰富”“口语化”。当时的很多作品都体现了作家在语言运用方面的转变,这种变化还广泛地运用在刻画工农兵劳模的报告文学中,他们用陕北的口语、俗语、民谣等具有民间特色的语言来描写劳模和农业生产。例如,在改版后的《解放日报》上有对生产英雄吴满有连篇累牍的报道,其中大量使用了民间口语,在叙述的过程中也尽可能通俗易懂,这一点在艾青的长诗《吴满有》中也有所体现。虽然来自五湖四海的作家们对这种所谓通俗化的语言,在具体运用中时常常很牵强,但是这种在《讲话》的响应下兴起的工农兵语言却奠定了农村题材文学作品的发展。这种创作语言上的变化导致的结果是,从此之后有着口语化、通俗化语言的农村题材作品不断涌现,赵树理、柳青、浩然、周立波等一大批善于描写农民的作家活跃在中国文坛上。为此,有研究者认为,延安时期文学语言方式的转变是“现代汉语史的第二次语言革命”^[7]。

四、结语

以延安整风运动与《讲话》的发表为界,大部分

延安作家在创作思维、革命意识、语言表达方式和创作题材的选择等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转变,报告文学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现了这种转变的发生,由此可以窥视出整个延安文艺转型时期的概况。延安文人书写的一篇篇记录“真人真事”的文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延安文学的走向,几乎奠定了中国文艺的“新方向”,从此建立了“党的文学”“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基本样式。

在延安文艺的转型过程中,报告文学只是其中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对《讲话》中指导思想的落实和对政治意志的配合。延安文艺整风的目的最终也在于尽快促成作家这种思想和阶级意识的转变,延安文学在统一的革命话语指导下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

参考文献:

- [1] 艾克恩.延安文艺回忆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 [4] 王克明.延安文艺:从繁荣到沉寂[J].炎黄春秋,2013(3):79-82.
- [5] 艾青.艾青全集:第5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
- [6]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M].上海:新华书店,1949.
- [7] 杨劼.延安与中国文化转型[J].文艺争鸣,2012(5):24-30.

View on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 transition from reportage literature creation

SHANG Chang-bao, QIU Sheng-nan

(School of Literatur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As a watershed in Yan'an literatur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and Mao Ze-dong's *Speech in the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Speech*) leads to a dramatic turning point for literary creation and explanation for theoretical discourse. From the comparison of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 condition before with those after the start of Movement, reportage as a perspective emerges quickly after the *Speech* published. It not only becomes the crucial literary style to practice *Speech* which highlight the spirit of "art services for the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but also becomes the important symbol for transition from integration to pluralism of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

Key words: *Speech*;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 reportage; Rectification Movement